

邓云乡集



诗词自话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邓云乡集

诗词自话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词自话/邓云乡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6

(邓云乡集)

ISBN 978-7-101-10834-7

I.诗… II.邓… III.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7941号

书 名 诗词自话

著 者 邓云乡

丛 书 名 邓云乡集

责任编辑 彭 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⁵/₈ 插页4 字数28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834-7

定 价 41.00元



小丁绘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

近擬楹帖

一擬黃季剛師

芳艸有情夕陽西下
落花無緒逝水東流

二集成句

竟夕相思三生白
嘆華月一枕兩下蓬

三酒家新張嵌字

魚羹酒炙奚翅食重
賓筵家慶樂飲情同

雲驟兄正

俞平伯



邓云乡藏俞平伯诗词稿

復旦大學

雲鄉同志：

承示大作几首五古詩篇，
拜讀之下，非常欽佩。古詩
貴在蒼老而不晦澀，若大作者
斯，臻此境界矣。

這二、三年來，我抽空拜老喻
為師，日學東坡墨迹約半小時，
間或塗鴉公贈亲友。茲不揣
醜陋，舛成條幅附后，務請
哂納并祈為改為荷。

此，順頌

撰安

蘇步青

1981. 1. 13

苏步青致邓云乡函

(三) 附件

南开大学

鄧云鄉先生

自今年九月在仰光
晤之後，倏忽已屆歲末，半
年多我經歷常在旅途奔波
之中，前時自台歸，林先生
送下份心意，端之書信，步路
及繪，亦謝焉。

適且我九於十一月底返國，
目前在天津，南開大學講學，
通函以此地為天津 300071/
南開大學專家家程師室，中
話 (02) 350-5216。

我將在天津，留至明年一月
中旬，以便轉往日下及台，
謝呈拙作，請潤稿一份，敬
祈賜正，此上即頌
新年萬福。

葉嘉榮 上 十二月

十二月

叶嘉莹致邓云乡函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经改者加注说明。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我与诗词(代序)

诗,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什么是诗?我也说不明白。这都是老实话,自然,让我东拉西扯瞎吹,我也能吹出不少。但那只是瞎吹,穷聊,乱侃,那不是老老实实的真话,实话……但是我虽然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却似乎有时偶然有那么一点感觉,居然也会写出一些似诗非诗的东西,有时还刊登在报纸上,而且现在居然编成一本《诗词自话》准备出版,是自己过去很少想到的,却成为现实,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因而编完了,先想在前面作个说明。说说我与“诗”——这个说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它”的关系。

前年我偶然接到远在山西雁北、大同古城的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朋友韩府的来信,信中附了一个书目,问我与所附书目中的作者是否有宗亲关系,因为他从读我的一些书中,了解到我原籍是山西灵丘县,就寄来灵丘邓氏一些古人的书目,内开:

邓克劭,字如许,清灵丘人,著有《自适集》。

邓克昭,字晋德,克劭弟,岁贡生,著有《月令拾遗》、《灯余草》。

邓赞清,字少参,号梅亭,克劭子,恩贡生,著有《梅亭诗草》。

邓永清,字晓村,克劭子,乾隆丁酉拔贡,著有《南阜山房集》。

我得着这封信十分珍贵,因为我知道邓永清这个名字,小时在老家东河南镇北街戏台正面大匾,黑地金字:“霓裳羽衣”,上下场门小匾,白地黑字“今演古”、“假作真”,署款就是邓永清。我记得十分真确,而且直到五六十年代回北京,父亲说起家族旧事,还常常说“永清爷长……永清爷短……”等等,而且也知道他是“拔贡”。清代“拔贡”是没有考中举人的秀才,每隔十二年才考一次,一县只取一名,再到京中朝考,一等也可外放知县,也是很不容易的。是举人、进士而外,仕途中的一种特殊功名。一看这位老祖宗父子兄弟居然都有著述诗集流传下书名来,也是极为可喜的。而且我长期因听父亲说起,便误记这位老祖宗是我高祖父,但一看科甲年份是“乾隆丁酉拔贡”。乾隆丁酉是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而我曾祖父邓飞熊,是同、光时代的人,往前数二三十年,离开一七七七年还差半个世纪以上呢。我甚至怀疑乾隆丁酉是道光丁酉,即一八三七年,但又想材料虽是抄的,且十分清楚,如抄自古书不大会错,为此一直怀疑着。去年河南有家《寻根》杂志,让我写文章,我很感慨,又因老家祖居全部被地方拆光了,只剩一口井了,祖坟也被铲平改建车站了,小小老百姓生逢乱世,流浪在外,能保住一条命就很不错了,什么“根”?如何“寻”?早被连根拔了,还谈什么“寻根”呢?又一想,居然又有不相识的朋友,辗转寄来祖宗的书目,而且十分清楚,是诗集,这是多么可珍的“祖德”呢?但是“高祖”永清爷和曾祖飞熊公年代相差太远,接不上代,如何办?过去家中有《亡疏折》,由远祖直到近三代,记得清清楚楚,逢年过节,即使在异地他乡,也可以按折上所记,书写“亡疏”,祭祀各代祖宗,但这个《亡疏折》,“文革”时,早被抄家的“革命家”们当反动罪证抄走,不知哪里去了。这样我的高祖是谁?名讳是“某某”,就成永远

的“？”了。但又有峰回路转之趣，最近山西文化厅厅长好友成葆德兄寄来一本《灵丘县志》，我才弄清了曾祖父邓飞熊的父亲、亦即我的高祖父名邓绍宗，曾祖的祖父名邓景元，亦即我的五世祖了。由曾祖往上数，再接两代，一般以六七十年计，才能接上十八世纪的乾嘉盛世，接上乾隆丁酉拔贡的永清公，那就是六世祖了。因而地面上的根，祖坟虽然掘了，祖宅虽然铲平改建粮仓，似乎“连根拔”，无处可寻了。而各种文献还在，从文献记载上寻根，居然找到六世祖、七世祖，不但各代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各种著述，所以“根”尚是可寻的。“连根拔”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我写给《寻根》杂志那篇短文，迄未登出，大概是编辑或者错会我意，感到我的话说的不中听，所以冷处理了。其实这是历史，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在任何时代，既无力抗拒历史，也无心改变历史，“寻根”也者，也只是一句话，说说而已……“逝者如斯夫”，又真能寻到什么？不过遗憾的是，永清公以上那么些远祖辈著述了什么《自适集》、《月令拾遗》、《灯余草》、《梅亭诗草》、《南阜山房集》等等，我却一部也没有见过，多么引人思念呢！

过去有句古谚：“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直到今天，“积德”仍旧是一句普通话，也常常听人们在争吵时说：“积点德吧……”德是什么？自然科学上没有办法解释，但遗传学上的遗传基因，现在成了世界尖端科学。

先父汉英公一生也欢喜作诗，曾有两句诗道：

五百年來宅瀛陰，綿綿累世盡儒林。

这是一首律诗的起句，可惜原诗我背不出来了。瀛水是唐

河的古名，中国古地名习惯，山北谓之阴，水南谓之阴，如淮阴，在淮水南岸，江阴，在长江南岸，故乡东河南镇在唐河南岸，故称“滏阴”。我祖父邓邦彦，字选青，是举人出身。考中举人的人，都会作试帖诗，所谓五言八韵，形同连在一起的两首五言律诗，且限韵。但祖父去世过早，且又有大烟瘾，不照相，不知什么样子，也未见过他写的诗文，更不要说诗集了。年轻时听父亲说，老家有祖父两箱日记，其中或记有诗文，不过从未见过。而父亲却很喜欢读诗作诗，而且都写近体诗，一部《十八家诗钞》，老年时，一直放在桌子边，反复咏诵。晚年六十年代前期，还和北京几位老先生时相唱和。写过一本系统的《京华纪事诗》，一百二十首，有诗有注，我曾替他小楷抄过一个复本，用的是朵云轩的竖格纸，他十分高兴。前面有序，后署“序于不食马肝之庐”。用《汉书·辕固传》“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典，以寄托其感慨。原稿留在北京，所抄复本装订好放在上海我家中，“文革”抄家抄走了，北京原稿扫“四旧”时烧了。自然都没有了。至于他平日的诗，都未留稿（自然留稿也留不住），我全首一首也记不住，只记得一些断句。如：

来时烽火地，归路藕花天。

一九三六年晋南打仗后，我姑丈贾理宣被任为某县县长，只数月即被撤换，他写了三首五言律诗去安慰他。他曾讲给我听，我只记住这两句。另有“撮土补创痍”句，另一句也忘了。

乱世犹闻弦诵声，与君重见不胜情。

劫历红羊伤国脉，变同苍狗亦天心。

一望家山见忽明……

这是沦陷时期一九四三年冬，他冒险回故乡探望时写的三首七律的断句。第一联是在县城见一亲戚教私塾时赠诗的起联。第二联是另一首感事七律的颈联。第三是近灵丘县境见某山七律的起句。

偶过正阳桥下望，惊心不是旧腰围。

这是五十年代他送一同乡回老家时二首绝句一首的结尾二句。

窗前正读高士传，门外忽停长者车。

一九六二年间，他北京老年诗友中，有位洪老先生，做过天文台长，早期留日，年已八十余。坐三轮车到里仁街家中去找他，他写一首七律答谢，这是中间一联。但可能我记错，因平仄失粘，“士”、“者”二字都是仄声字，对不上。记得“文革”前我也曾替老人家抄了一本，虽然不多，也有几十首，也是用朵云轩那种素雅格纸抄的，只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机，能复印几份保存多好……真是历史的遗憾，现在无处寻觅了。靠我脑子记忆储存毕竟有限。我真佩服二千多年前的伏生，能够背出《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等许多书，连用孔子家庙鲁壁中拆出来的竹片《论语》核对都不错，可见伏生背诵的功夫，所以《论语》又

叫《鲁论》。但是中国两三千年的背诵的读书方法，自从五四运动以后，都为洋鬼子教育方法所代替，老的“背功”，没有人讲求了，所以我这一代就差多了。连老爷子的诗，只记得一些断句，整首的一首也背不出了，真是不肖子孙。有什么话说呢？

北大老教授罗膺中先生《鸭池十讲》中有一篇《诗人》中曾说道：

近二十年来，新诗发生，由外国诗的影响，诗人一名，才又在新文坛上出现。于是，凡有一两本诗集出版者，大家便群以诗人呼之。诗人一名，几乎代替了当日的骚人墨客。

我不知道在外国是否应当如此，若在中国，诗人一名，是不应该如此滥用的。

所以，诗人这个题目，有重讲一次之必要。

罗文前面还引了《楚辞·九辩》：“窃慕诗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其实这位罗老先生太认真，当年那些男女学子，能哼两句“妹妹我爱你……”或“热血沸腾了……”的新诗，以及哼两句“薛蟠体”的平平仄仄的打油句，谁不想戴一顶诗人的桂冠呢？我作中学生时也曾上过这个瘾，也写过新诗，也学过平仄。自然多少也受点老太爷的影响，也受点学校老师的影响。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国文老师名陈斐然，鲁迅先生住砖塔胡同时，他常去看望，《鲁迅日记》中多次记到。也是苦雨斋座上客，而且还请知堂等名教授。《周作人日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记云：

又往忠信堂应斐然招宴，到者玄同、劭西、幼渔、子鹤、检斋、凤举、淑孙、祥×女士及陈君夫妇共十一人，九时回家。

钱玄同、黎锦熙、马幼渔、黎子鹤、吴检斋、张凤举等当时师大、北大经常来往苦雨斋的名教授都到了，可见陈斐然先生当时的身份，也可能新婚不久请老师，总之不同于一般老师，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沦陷八年的中期，一九四一年，陈先生教我们国文，讲唐代时期，讲唐诗，一次作文，就以贫富生活的反差对比，让我们拟一联七言律诗对句，简单说就是七言对子。而且让回家先想，我回家在父亲的帮助下拟了三副，现在只记得其中联是：“一派弦歌舞狐步；几家风雪泣牛衣。”学生初学，用字较为粗俗。第一句前四字，我原是“一阵弦歌”。陈先生说这一联对仗不错，只是“阵”字不好，改为“派”字。回到家中，父亲也说改得好。这样我对旧诗有了一些体会。但平时读了些古今人的诗，平仄懂了些，自己却不会作整首的诗，也没有想过。

一九四三年春，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旁听夏枝巢先生讲诗词，时清明节近，忽有所感，写了四首绝句，现在只记得一首：

陶家庵畔草初生，一路春禽送好声。
只是有家归未得，年年客里过清明。

当时这四首绝句自然十分幼稚，只是陶家庵是故乡祖坟，童年在家乡时，年年清明，必伴随父亲去上坟祭祖，自到北京后，过了两年，就“七七事变”，再不能回老家去上坟了，所以感慨，写了四首小诗。因感情真挚，送给枝巢老人修改，老人改得十分细微。记得第三首结尾两句原来是“弱弟不知愁况味，声声频唤叠金钱”。枝巢老人把这两句都改了，前一句如何改，忘了，后一句改为“纸灰白袷晓风单”，回家父亲看了说，不如原来句子真切。抗战胜利后，我在北大上学，和陆语冰先生在《新民报》“北海”

版上唱和七律，叠韵至七八次之多。首唱是我的，用“微”、“灰”韵《游陶然亭》二律。语冰先生和章用《江亭》题，用“微”、“灰”韵。后来三叠四叠，越和越多，题目就记不清了。

由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忙于找门路混饭吃，忙于交女朋友找对象，忙于交待历史、改造思想，忙于写交待、写检查、写检讨，忙于听报告、开会……空下来也读读古人诗词，至于自己写，那就再无此闲情逸致了。一九五六年正式调到上海，安顿了家，已经三十来岁，教书生涯，看书就多起来了，思想也细了，静了，有时偶有真情实感，便触动了诗的思致。有一次看报，见到一则救济民间艺人的新闻。我认识一些民间艺人，知道他们的一些身世，看了新闻，的确感慨系之，感到社会安定的好处。当时正是一九五七年初，形势很好，便写了两首七律，投寄当时《新闻日报》“人民广场”副刊，很快就登出来了。黄炎培老先生在北京见了写了一篇为《有感》的杂文，文章一开头就写“因他有感，使我有感”如何如何，这样等于捧了我的场，从此我又向报纸投稿，写短文，也写旧诗词，当时稿费高，物价低，足以补贴生活了。一直拖延到六十年代前期。这一期间，旧诗词写了不少，但发表的很少，大多是没有发表的，有的是自己有感随意写的，如自然灾害饥饿时期，想起旧时什么吃的东西都发馋，什么烤白薯、芝麻酱烧饼、一和汤面、豆腐脑等等，都仿知堂老人回忆诗写法，写了不少首散文式的五言古诗：现在只记得《烤白薯》起句为“长夏种山蕨，牵藤日壮足”两句，其他都忘光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九六三、六四两年，稍得丰足安定，也和友人写了不少唱和词，这些当时都有杂稿，后来抄家都散失光了。

在上海安家后，北京旧时师友，只有知堂老人偶然通通信。关于诗词，老人曾用我寄赠的绿色毛边稿纸小楷抄了两首《往昔